

东南亚华人多语能力现状调查及层次分析

姚 敏, 韦九报

[摘要]文章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3个国家的292位华人及新移民的多语能力和使用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东南亚华人普遍拥有多语能力;华语、英语能力相对较好,在工作中使用最多,属于第一层级的语言;第二层级基本范围是当地主流语言;第三层级是汉语方言,使用较多的是粤语、福建话和客家话。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国家都应该意识到多语能力的重要性,珍惜、重视多语能力,积极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多种语言资源,更有效地提高语言资源价值。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多语能力;使用场域;语言资源

[作者简介]姚敏,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韦九报,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北京102206

[中图分类号] H0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5)0X—001—09

多语能力,顾名思义,是指个人或社团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包括方言)知识,或者具有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能力。多语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很多,最明显的因素是移民。当一种语言使用者迁居另一语言使用地区时,这批移民一方面继续使用原来的语言,另一方面为了交际的需要又学习了另一种或多种语言,从而产生了多语使用的社团^①。据统计,海外华侨华人数量已经达到6000万,其中东南亚华侨华人约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8%^②。移居海外的华人不仅要掌握住在国的国家通用语、民族语或方言,还要掌握国际通用语——英语,再加上大部分东南亚华人注重乡土观念,华文教育历史悠久,华人社团相对发达,当地华语生活丰富,华人之间常用华语交流,并且大部分东南亚华人来自中国的东南方言区,方言保持相对较好。正是由于上述历史、地域、生活需要、习俗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华人中“多言多语”现象格外引发学界关注。东南亚华人掌握了哪些语言、孰强孰弱、在不同场合使用何种语言,为什么不同人的多语能力最终有所差异,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调查实施情况

为深入了解东南亚华人多语能力现状及其多种语言使用情况,本文采用调查问卷加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了相关信息。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2份,有效率为97.3%。

笔者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和泰国3个国家中选择了3位“多语”人士作为深度访谈对象。这3位访谈对象都是精通华语,熟悉当地言语社区,在事业上相对成功的专业人士。访谈是为了弥补调查问卷的缺漏,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从结果来看,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帮助我们更加完整、全面地了解东南亚华人多语能力的现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19ZDA311)

①张相铭.多语能力研究综述[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0(4):48-51.

②吴前进.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华人:旧问题 新忧虑[J].国际关系研究,2016(6):34-44,150-151.

本次调查对象以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3个国家懂华语的华人为主,其中19.9%来自马来西亚,24.7%来自印尼,24.3%来自泰国,还有31.1%的调查对象为新移民以及一部分在上述国家工作生活的新加坡、菲律宾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裔。从年龄分布来看,18~29岁的占44.9%,30~39岁的占34.2%,40~49岁的占11%,50~59岁的占6.2%,60~69岁的占2.1%,70~79岁的占1.6%。被调查者的职业分布为:教育工作者>公司职员>自由职业者>商业工作者>自主创业者>无业者>工业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从工作年限看,工作1—3年的占比31.5%,工作4—5年的占比13.4%,工作6—10年的占比27.4%,工作11—15年的占比11%,工作16年以上的占比16.7%。调查者中有65.75%的受访者的工作与中国有关或在业务上有联系。

本文调查了华语(普通话)、英语、马来语、印尼语、泰语,以及汉语粤语、福州话、客家话、海南话、福建话、闽北话、潮州话和其他(可自填)等13种(类)语言的使用情况。调查问卷设计汉语方言选项时,主要根据东南亚华人方言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增减。东南亚华人早期移民多是以方言族群聚集,因而东南亚华人的方言族群不同于国内,有“五帮”之说,即海南、广肇、客家、福建、潮州五个方言群。东南亚华人用“福建话”指代“闽南话”。潮州话和海南话虽然是闽南话分支,但也依照新马华人的习惯单列^①。问卷调查分为背景调查和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调查。背景主要调查答卷人的性别、年龄、工作或行业、工作年限、工作是否与中国相关、月收入、收入水平自判,共7项。第二部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等客观情况的调查,分为6个维度,共66项。

二、东南亚华人多语能力现状

伴随着世界人口的流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说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相互联系日益密切。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具备双语或多语的能力。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共建。共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全方位加强沟通是实现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政策沟通的重要基础,语言是加深各国之间互联互通、增进彼此之间了解的重要工具,多语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3个国家是东盟成员国,也是“一带一路”共建重要国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这些国家本身都具有丰富的语言类型,语言资源丰富。其次,这些国家华人移民历史悠久,大规模移民最早可追溯到清朝中期,华裔众多,不少已在当地形成家族,因此这3个国家的华人社会都相对完整,华语及方言环境相对良好。最后,这3个国家华语保持都比较好,以马来西亚为例,马来语是唯一官方语言也是国语,英语是通用语言,华语和泰米尔语是比较重要的少数族裔语言。大部分马来西亚华裔都是多语者,他们为了更好地融入以马来文化为主的多元社会,就需要掌握国语——马来语、国际通用语——英语。马来西亚华裔对华文教育的长期坚持也使当地华人普遍保持了良好的华文水平。除了马来语、英语、华语,受家庭和社区影响,很多华裔还会讲汉语方言,如粤语、闽南话、客家话、海南话等,是真正的“多语多言”者。

(一)调查对象背景对多语能力的影响

为了研究多语能力的影响,我们将调查对象在12类语言能力上的得分进行平均,最终得出“多语能力”数值。再对多语能力与背景因素进行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后发现:来源、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工作与中国的关系、月收入和所在行业均与多语能力有显著相关关系。

①朱妮妮.海外华人姓名使用情况调查——以新马华人姓名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21(1):91-99.

1. 不同样本来源者多语能力情况

从来源看,来自马来西亚的调查对象多语能力最强,其次是印尼。多语能力相对较弱的是泰国华裔和各地新移民。从标准差来看,多语能力较高的虽然是马来西亚、印尼的调查对象,但离散性也较高。这表明这两个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的多语能力很强,但也有一部分人的多语能力相对较弱,可见,多语能力分布并不平均。

2. 年龄与多语能力相关分析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的多语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从平均值来看,年龄较高者的多语能力更加突出。50~59岁者的多语能力最高,60~69岁者的多语能力次之,第三是40~49岁者,第四是70~79岁者,第五是30~39岁者,最低的是18~29岁者。从标准差分析来看,老一代的调查对象多语能力普遍较高,年轻一代的调查对象多语能力普遍偏低,当前年轻人的多语能力明显不如老一代。中间年龄段者的多语能力差异性较大,有的群体多语能力较强,有的则较弱。

3. 工作行业、收入与多语能力相关分析

不同行业的调查对象的多语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从平均值来看,自主创业者的多语能力最高;其次是教育工作者、商业工作者、工业工作者;较低的有农业工作者、公司职员、无业者和其他。从标准差来看,较高收入者的离散性也较高,显示出有部分人的多语能力比较突出,另一部分人则明显滞后。相较而言,较低收入者的多语能力比较趋同,普遍较低。

4. 工作年限与多语能力相关分析

调查显示的基本趋势是,工作年限与多语能力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工作16年以上的调查对象多语能力最高,其后是11~15年者、6~10年者和1~5年者。从标准差来看,工作年限较高者的标准差较高,说明这部分人有的多语能力较好,而另一部分人则较差。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多语能力普遍偏低。

(二) 探因分析

国别、年龄与多语能力的结果与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3个国家历史呈正相关。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上述3个国家的华文教育开展得比较好,对华语的普及和传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不过,在那个阶段华人不大重视英语、住在国国语等其他语言的学习,因此虽然华语能力较强,但其他语言能力相对较弱。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许多东南亚国家开展了民族民主运动。以印尼为例,当时的政府采取了比较极端的语言政策。华语和华校被禁,华语的传承退回了家庭领域,所幸华人家庭长辈华语传承较好,所以不少华人的华语在家庭内得到了传承。与此同时,住在国政府加强了英语和住在国国语的教育。因此,40~60岁的华人多语能力相对较好。但是,华语特别是汉语方言的传承由于仅仅在家庭或家族内部传承,无法扩大使用域,传承效果十分有限。到了当前年轻一辈,对华语和汉语方言的保持就更不如他们的前辈。

进入21世纪,随着“汉语热”的兴起,各国对华文教育又重新重视起来,不仅华校得到了恢复,许多公立学校还将汉语作为一门外语课,可以预见年轻一代的多语能力将会发生新的变化。除印尼外,泰国也有类似的历史,只是语言政策相对柔和,采取的是同化政策。上述3个国家中,马来西亚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加上华人的斗争与坚守,使得其华语传承保存良好,汉语方言的使用并不限于家庭内部,还拓展到了华人社区。但是,从我们的调查和访谈来看,马来西亚华语传承各地也不均衡,甚至出现了一些倒退,反而是非华裔学生开始愿意去华校就读,学习华文。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与华裔家长没有意识到多语能力对于其的孩子是一种资源,会带来经济效益有关。

在早期移民中,东南亚华人方言群会和职业相关。例如,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地区,早期华人社会因为生产活动的用语都是方言,遂形成某一方言群垄断或专长于某一行业的现象:潮州人几乎垄断杂货和市场的生意;广府人多有一技之长,因此多从事工匠、建筑、铁器、木工等行业;客家人则在市区主要经营药材、洋服、当铺等;福建人则多为树胶商人,或者当劳工谋生;海南人从事咖啡餐饮等^①。不过,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早期移民来源不尽相同,因此各国各地区的情况也很复杂。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曾分析过华人方言群体的先天特性如何与海外职业相关联的原因^②。如今,这种现象或多或少还存在。不过,我们的调查更多关注的是华人的多语能力。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工作行业中自主创业者的多语能力最高。自主创业者由于拓展业务需要会与不同地方的人打交道,以马来西亚为例,槟城华人主要讲福建话,吉隆坡华人则主要讲粤语,自主创业者如果能讲不同地方的方言,谈生意自然会便利得多,如若涉及跨国交易,那就需要其具备不同语种的交流能力。因此,自主创业者需要具备多语能力。事业做得越大,就越需要这种多语能力。当然,如果只是在当地做小本生意,多语的需求也就不大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部分调查的离散性比较大。而多语能力较低的人群的职业特点限制了其活动范围,因此对多语能力的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了。

工作年限与多语能力的关系呈正相关,工作年限越长多语能力就有可能越好。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受访者的工作中需要用到多语能力。如果一份工作需要多语能力,那一定是使用多种语言的时间越长多语能力就越强。语言是为了使用,如果在工作中能够不断使用到不同语言,不同语种的语言能力自然会越来越好。因此,对多种语的运用能力是与工作年限呈正相关的。

(三)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结果

我们从汉字使用、语言能力、工作用语、家庭用语、社交用语、网络用语6个方面来统计调查对象的情况。

1. 简繁体字使用调查

从汉字使用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调查对象在工作中使用简化字,占比91.8%,使用繁体字的占比仅为3.4%,另有4.8%的人表示为其他情况。选择其他情况的人,基本是两种情况都使用,如“大部分时候用简化字,但是在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人接触时,使用繁体字”“在中国台北念书使用繁体字,在中国上海工作用简化字,在马来西亚两者兼用”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推行普通话和简化字的成果已经惠及海外华裔群体。还有不少华裔可以在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自如切换,汉字使用和书写能力也是语言能力的表现之一,这种能力无疑会给海外华裔带来更多便利。从“大华语”视角看,这种简繁汉字自由转换使用的能力,会使得东南亚华裔在未来全球化的竞争中更具优势。

2. 语言能力调查

语言能力的调查分别从语种、语言使用域和国别几个视角去考察。从调查对象掌握的语种来看,东南亚华裔总体而言掌握最好的语言是华语(普通话)($M=4.4, SD=1.09$)^③,其次是英语($M=3.05, SD=1.24$),再次是当地主流语言,如马来语($M=2.16, SD=1.59$)、印尼语($M=2.22, SD=1.69$)、泰语($M=2.11, SD=1.58$),最后是汉语方言,其语言能力从高到低依次是粤语、福建话、客家话、潮州话、福州话、海南话和闽北话。

①根据马来西亚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资料整理。

②[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42.

③M为平均值,SD为标准差,下同。

还有调查对象表示他们或多或少会一些泰米尔语、缅甸语等。可见,这些国家的华裔多语能力范围要比我们调查的范围更广。

从各种语言得分的标准差来看,调查对象在当地语的水平上标准差最高(SD 印尼语=1.69,SD 马来语=1.59,SD 泰语=1.58),在部分汉语方言上标准差最低(SD 福州话=0.49,SD 海南话=0.45,SD 闽北话=0.45),在华语、英语和几个主要汉语方言上的标准差中等。这表明,调查对象对当地主流语言的掌握离散性很高,有部分人水平较高,而部分人水平较低,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联系,也就是说,在调查对象中部分人和主流社会联系紧密,而部分人则与主流社会联系较少。深入考察发现,调查对象在汉语方言能力上的差别不如当地主流语言明显,或多或少都会说一些。虽然华语和英语能力最高,但是离散性一般,个体内部差异不如当地主流语言,但是高于部分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复杂多样,东南亚地区尤甚。我们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并没有严格按照语言学意义区分方言、次方言,而是根据我们多年在海外的实践和观察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同时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题目,调查对象可以添加自己的方言。从调查结果看,不仅是汉语方言,不少调查者还掌握了住在国方言、其他东南亚国家相似的语言和住在国其他民族的民族语。可见,海外华人的多种语言能力与所处地域、移民来源地、工作和受教育的地区均有关系。

3. 工作用语调查

除语言能力外,本文还从语言使用域的角度考察了不同语言在不同场域的使用情况。我们将领域分为工作、家庭、社交和网络4个常见维度。从在工作中使用的频率来看,排序也和调查对象的语言能力类似。最高的是华语(普通话),其次是英语,再次是当地主流语言,工作用语的使用频率为:泰语>印尼语>马来语,最后是各类汉语方言。另有回答“其他”的得分不低,包括泰米尔语、印地语、菲律宾语、日语、韩语、江西话、兴化话等。这表明在实际工作当中,语言的使用情况更加复杂,使用何种语言取决于工作中合作伙伴使用的语种,这就需要被调查者有在多种语言之间转换的能力,也表明调查对象与周边国家交流较多。

从标准差来看,调查对象掌握当地主流语言的情况最为复杂,离散性也最高,华语和英语离散性中等,其他汉语方言虽然在工作中使用频率较低,但是大家情况相近,离散性最低。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对几位访谈人单独的深度访谈中得知,在与海外华商做生意时,使用汉语方言的效率最高、效果是最好的。很多用住在国国语、英语甚至是华语都谈不下来的生意,有时候只要用潮州话或者客家话进行沟通,难题常常会迎刃而解。访谈人之一的马来西亚华裔李先生说:“我和你分享一件有趣的经历,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槟城买房产,希望能多些折扣,开始的时候用马来语,后来用英语,最后用了华语,但不管我用哪种语言,对方都不肯松口。后来我发现他说潮州话,就开始用潮州话和他聊天,没想到,我们的距离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用潮州话越聊越开心,最后他主动给我打了折。因为我从小走南闯北,会的方言比较多,从那以后,我经常用方言试试和对方拉近关系,结果真的是屡试不爽,只要我开口讲方言,那种亲切感瞬间就建立起来了,生意就好做得多。”^①其他两位访谈者也有类似的经历,这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方言的地位和作用。自古以来,中国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做生意要想获得成功,良好的感情交流是十分重要的。方言就是同乡之间快速拉近距离的敲门砖,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大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自古就有较强的宗族乡土观念,崇尚互相帮助,相互扶持。方言就像是一个“通行证”,为双方经贸投资合作提供了便利。

①据2023年9月8日在线上与李先生的访谈资料整理。

表 1 调查对象工作用语频率情况

工作语言	用频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工作语言	用频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华语	4.17	1.30	客家话	1.35	0.96
英语	2.58	1.29	其他	1.29	0.94
泰语	1.96	1.63	潮州话	1.25	0.76
印尼语	1.95	1.58	海南话	1.04	0.36
马来语	1.74	1.34	福州话	1.03	0.24
粤语	1.44	1.01	闽北话	1.02	0.14
福建话	1.39	0.97			

4. 家庭用语调查

整体而言,在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中,呈现出华语独大的局面。华语仍然是调查对象家庭生活最主要用语,得分远高于英语和当地主流语言。总体而言,汉语方言在家庭中的使用率较低,但是有3种特别的情形。第一,马来语虽然是当地主流语言,但是在家庭中使用率较低,尚不及某些汉语方言。这可能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相对比较成熟完善相关。第二,一些汉语方言在家庭领域仍占有一席之地。福建话、客家话、粤语和潮州话虽然均值都不高,但是相对而言,处于中等水平。第三,选择“其他”的调查对象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不仅有“阿拉伯和乌兹别克斯坦语”“高棉语”“菲律宾语”“爪哇语”“泰米尔语”“印地语”“韩语”“日语”等,还有“河南语”“江西话”等汉语言,语言丰富程度远超我们的预期。

从标准差来看,华语虽然是华裔家庭使用最多的语言,但是离散性也是最高的($SD=1.66$),这表明有一部分家庭用语中,华语是绝对主力,而在另一部分家庭里,华语几乎不用。当地主流语言在家庭中的离散性也比较高。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3个国家中,泰语的家庭使用率最高,其次是印尼语;由于马来语离散性较低,可以认为马来语在家庭中较少使用是较为普遍的情况。汉语方言在家庭中的使用情况,差异性不大。

表 2 调查对象家庭用语频率情况

家庭生活语言	用频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家庭生活语言	用频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华语	3.68	1.66	潮州话	1.38	1.07
英语	1.93	1.15	其他	1.36	1.07
泰语	1.92	1.62	马来语	1.34	0.82
印尼语	1.88	1.56	海南话	1.04	0.31
福建话	1.61	1.24	福州话	1.03	0.29
客家话	1.45	1.10	闽北话	1.03	0.22
粤语	1.40	1.00			

5. 社交用语调查

在社会交往用语层面来看,也是华语独大的局面,其使用频率得分最高,其次是英语,再次是当地主流语言(泰语>印尼语>马来语),最低的则是汉语方言。选择“其他”的调查对象,如使用“泰米尔语”“印地语”“俄语”“韩语”“江西话”“兴化话”“四川话”等语言进行社会交往。

从标准差来看,离散性最高的是当地语言泰语和印尼语,其次是华语和英语,马来语和其他汉语方言离散性相对较低。一部分调查对象普遍使用泰语、印尼语,而另一部分人则很少使用。一般或多或少都会使用华语和英语,普遍较少使用马来语和汉语方言进行社会交往。

表3 调查对象社交用语频率情况

社交用语	用频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社交用语	用频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华语	4.08	1.36	客家话	1.40	1.03
英语	2.54	1.30	潮州话	1.36	1.00
泰语	2.01	1.64	其他	1.33	1.00
印尼语	1.98	1.63	福州话	1.04	0.29
马来语	1.58	1.15	闽北话	1.03	0.22
福建话	1.52	1.14	海南话	1.02	0.21
粤语	1.49	1.06			

6. 网络用语调查

从网络生活用语看,华语仍然是东南亚华人网络世界主要交流语言,其次是英语,再次是当地主流语言(泰语>印尼语>马来语),最低的是汉语方言和其他语言。从标准差来看,华语和英语的标准差并非最高,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这表明,在网络生活中,调查对象较为普遍地使用华语和英语,其次是当地主流语言,最后是汉语方言^①。

表4 调查对象网络用语频率情况

网络生活用语	用频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网络生活用语	用频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华语	4.24	1.23	福建话	1.28	0.85
英语	2.99	1.41	客家话	1.19	0.70
泰语	1.98	1.59	潮州话	1.17	0.67
印尼语	1.92	1.60	福州话	1.03	0.26
马来语	1.50	1.04	海南话	1.03	0.23
粤语	1.36	0.96	闽北话	1.02	0.18
其他	1.28	0.91			

7. 不同样本来源者语言能力对比

以上是不同场域各种语言使用情况的分析,从不同来源的被调查者的多语能力来看,仍然会有不同的发现。根据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调查者的来源与多语能力存在显著相关, $r=-0.692^{**}$, $p<0.01$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来源的调查对象的多语能力存在显著差别。 $F(4,287)=88.558$, $p<0.01$ 。从来源看,来自马来西亚的调查对象多语能力最强($M=2.68$),其次是其他($M=2.25$),印尼的调查对象为($M=2.19$),相对较低的是泰国($M=1.84$)。其他类人群是从其他国家到上述3个国家工作的华人,其多语能力有助于他们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从标准差来看,多语能力较高的马来西亚、印尼的调查对象,离散性也较高(SD 马来语=0.43, SD 印尼语=0.36),这表明这两个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的多语能力是很强的。

具体而言,马来西亚的调查对象语言能力最强的是华语,第二是马来语,第三是英语,第四是粤语,第五是福建话,第六是潮州话,第七是印尼语;印尼的调查对象语言能力最强的是印尼语,第二是华语,第三是英语,第四是马来语,第五是客家话,第六是福建话,第七是潮州话;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相邻,在历史上同属马来半岛,当地主流语言相近,受访对象表示两种语言与中国国内的方言相似,差异并不大,相互交流基本没有问题。泰国的调查对象语言能力最强的是泰语,第二是华语,第三是英语,其他语言能力基

^①方言在网络上与华语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用词上。

本持平。新移民语言能力最强的是华语,第二是英语,第三是粤语,第四是泰语,第五是福建话,第六是客家话,第七是潮州话。这类人群对华语和汉语方言的掌握较好,且普遍受过较好的英语教育。

不同来源的被调查者的多语能力详细数值情况及平均值简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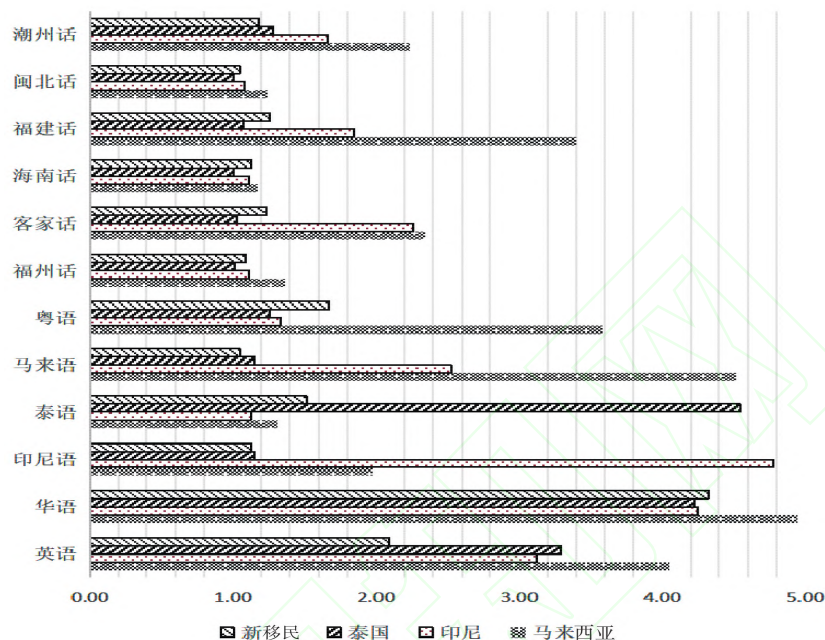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来源的被调查者的多语能力详细情况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第一,马来西亚调查对象最强语言能力不是马来语而是华语,这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对华语的坚守。马来西亚调查对象多语能力最突出,在粤语、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方面具有明显领先优势。第二,华语和英语基本在各类调查对象中都排在前三名,反映出这两种语言较强的通用语能力。第三,在汉语方言中,印尼调查对象最强的是客家话,马来西亚是粤语,泰国是潮州话和粤语,只是领先优势并不明显。这反映出东南亚地区华人所掌握的汉语方言主要是以上述方言为主,如果从早期中国人大量移民东南亚比较集中的清朝中期开始算起,方言的传承已经至少有7~8代,而在海外华文学校大多采用华语作为教学语言后,方言的传承就主要集中在家庭或家族之中。由于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3个国家的华人社会比较成熟,使得方言的使用空间进一步扩大,华人会馆、社团的存在也为方言的传承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东南亚华人多语能力的层次分析

东南亚华人普遍具有多语能力,至少3种,多的有8~9种,包括英语、华语、住在国国语、多种汉语方言及住在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对不同语言掌握程度和使用场域各有不同。从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上看,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层级。

在多语种中,东南亚华人华语、英语能力相对最好,在工作中使用最多,属于第一层级的语言。调查对象的华语能力和在工作中使用华语的频率高于英语。这表明,在本调查中,华语已经在应用的范围方面超过了英语,特别是在家庭用语领域,华语远远超过其他语言。

第二层级基本范围是当地主流语言,马来语、印尼语、泰语。但属例外情况的是,马来语在家庭用语领域中使用很少。从调查结果来看,马来西亚华人的多语能力最强,华语能力也是最为突出的,这得益于

当地华文教育的发展。经过马来西亚华人及华社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争取和坚持,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已经形成了华文小学、独立中学和华文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格局。马来西亚华校基本都采用了三语教学,再加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比较完善,方言保持相对完整,这些都为当地华人华语保持创造了良好环境,为多语能力的获得和提升创造了条件。

第三层级是汉语方言。与前两层级语言相比,在工作和生活领域使用较少。本层级汉语方言中,在工作、家庭、社会交往和网络领域使用较多的方言是粤语、福建话和客家话。不过,尽管汉语方言属于第三层级,但在一些特定场域,汉语方言也是海外华人群体重要的语言资源。特别是在与海外华商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做生意、打交道时,会当地方言可以将工作关系迅速转变为老乡关系,可以使生意的进行变得更为顺畅。这些都间接增加了方言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印证了李宇明教授的观点,他提出的“东南方言之桥”中指出的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和吴方言等东南方言经济价值较高,它们本身处于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和海外联系非常密切。这些方言架起了中国与港澳台、海外华侨的语言大道,其间蕴含的乡音情感对海内外资金的吸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①。

四、结语

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掌握多种语言就意味着拥有了更多信息和资源。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的参与者,多语能力已成为东南亚华人重要的能力和资源,更多的商机为多语者带来了更高的薪资收入。作为个体,多语者面对不同人群时自由转换语码的能力将会为他们带来更多信息、便利和价值。东南亚华人作为一个拥有多语资源的群体,积极充当双方语言“立交桥”的角色。面向住在国和祖籍国,拥有多语资源同样也是东南亚华人的一笔巨大财富,不论是哪种语言,都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源。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国家都应该意识到多语能力的重要性,珍惜、重视多语能力,积极保护、科学建设、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多种语言资源,更有效地提高语言资源价值。

(责任编辑:刘 娟)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Among Southeast Asian Ethnic Chinese: Status, Causes, and Tiers

Yao Min, Wei Jiubao (Beij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The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survey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practices of 292 Chinese individuals and new immigrants from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in Southeast Asia.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generally possess multilingual abilities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being their strongest languages. These two languages are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and are considered the first-tier languages. The second-tier languages primarily consist of local mainstream languages, while the third-tier ones include Chinese dialects, with Cantonese, Hokkien, and Hakka being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he study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for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It calls for the recognition, preservation, and active protection of multilingu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ir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utilization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language resources more effectively.

Keywords: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language fields; language resources

^①据李宇明2019年10月15日在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上的发言,主题为《推广普通话与扶贫事业》。